

【编者按】中华民族是在中原群体与周边群体几千年的交流交往交融、迁移互动混血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是“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从生物基础，或所谓‘血统’上讲，可以说中华民族这个一体中经常在发生混合、交杂的作用，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血统上可以说是纯种”。这篇有关方国瑜先生晚宴中交谈插曲的文章，以云南“纳西”为例，生动展示了我国西南地区不同族群在历史上的迁移、交融现象。张轲风的这篇文章提及方国瑜先生曾预言“想必有一日，西南民族之众名尽归于消失也”，“即纳西之名亦可废”。在方先生的心目中，这应该就是我国历史上族群关系直至民国时期的发展大方向。而我国自 50 年代“民族识别”后的群体认同却恰恰走向了另一方向，我们在 21 世纪是否需要对与之相关的理论、制度和政策进行系统的反思，难道不是我国民族研究者应当认真思考的问题吗？
(马戎)

【论 文】

方国瑜先生的晚宴¹

张轲风

《读书》2019 年 6 期新刊

方国瑜先生是西南著名史家，被誉为“南中泰斗，滇史巨擘”。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方先生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研读，一九三三年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毕业，曾师从钱玄同、陈垣、刘半农、赵元任、李方桂诸大家，最初治校勘、音韵、古文字之学，后来受边疆危机之感召，始专攻西南边疆民族史地研究。他自一九三六年任教于云南大学始，长达半个世纪，几乎凭一人之力开创了云南大学的中国民族史、中国边疆学、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等分支学科。

介绍方先生的文章，一般是这样开场的：方国瑜（1903-1983），云南丽江人，纳西族。与他的学术成就相随的，总有“纳西族”这个标签。方先生很少谈及自己的族籍，与大多数云南民族类似，民国时期的丽江方家有自己的“汉人”记忆，同时也有“纳西人”的身份，在双重认同中只好慎谈、避谈这个话题。根据公开资料显示，方先生只有在一次晚宴上偶然透露过一点信息，此次晚宴如今已渐成“佳话”，近年来为学界不断提及。其具体情形，始见于方豪先生在《陈寅恪先生给我的两封信》中的生动记述：

我初次认识陈寅恪先生是在昆明，时间大约是在一九三九年的秋间。那次是方国瑜先生邀宴。

……席间，由于宗族观念，我向国瑜先生询问：“宗兄！你们云南姓方的是从哪里迁来的？”他说：“我是桐城方氏的后裔。”……

饭后，顾颉刚先生把我拉到一旁，轻声告诉我：“方国瑜先生是么些（读如 Mo-So）人，说是桐城方氏后裔，只是面子好看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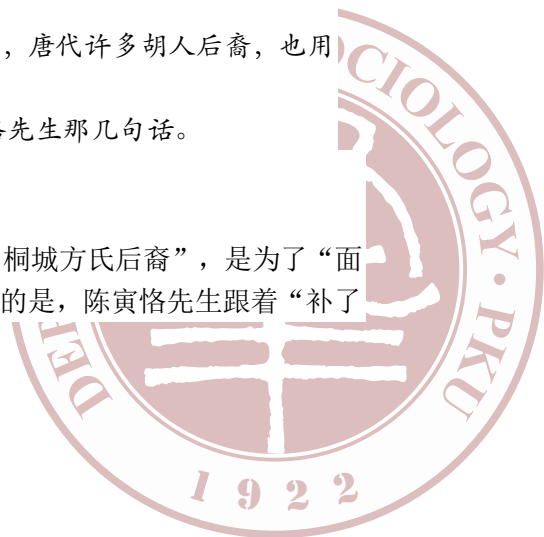
此时，陈寅恪先生在旁边，就插嘴说：“我们万不可拆穿他，唐代许多胡人后裔，也用汉姓，也自道汉姓始祖何处。”

这时，我恍然大悟。……那晚令我获益最多的，还是陈寅恪先生那几句话。

一、方国瑜先生的族籍问题

顾颉刚私下和方豪说：方国瑜先生是么些人，把自己说成是“桐城方氏后裔”，是为了“面子上好看些”。“么些”大致算是今天“纳西族”的旧称。有意思的是，陈寅恪先生跟着“补了

¹ <https://mp.weixin.qq.com/s/gOIJBxYAWvjfE22-apHrXw> (2021-11-5)



一刀”，说唐代“胡人后裔也用汉姓”，“自道汉姓始祖何处”。这一唱一和，尽管是私下讲的，给东道主留了“面子”，但无异于说方先生因缘攀附，自托高门。

果真如此吗？方先生的女儿方福祺曾在《方国瑜传》中自述家世：

丽江大研镇方氏，祖上不是本地人，而是安徽省安庆府潜山县大石桥人氏（此地离安庆府所在地约百余里），方氏祖上从方原仲起开始从军，时为元顺帝至正二十一年（辛丑年，一三六一年），隶九江府丞徐达麾下。甲辰年（至正二十四年，一三六四年）调南昌左卫中所军，在此居住十七年，并娶妻生子。到明朝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年）秋九月，方原仲随征南将军颍川侯傅友德率领的三十万大军征贵州、云南等地。……方原仲因随傅友德征云南有功，授云南左卫中所世袭百户官职。从此方原仲在云南定居下来，在这里生息繁衍，成为安徽省安庆府潜山县大石桥方氏入滇之一世祖。

根据方福祺的记述，方原仲一族在云南定居后，至清康熙年间由军籍改为民户，住在昆明。至嘉庆中叶，丽江有一赵氏，与方氏十四世祖方函宇时常来往。赵氏当时无子，方函宇第四子方庭凤入赘丽江赵家，从此方庭凤到了丽江。嘉庆二十五年（1820），方庭凤的儿子出生，不久赵氏夫人也诞下一子，因此赵家让方庭凤恢复本姓，自立门户。这样，方庭凤“成为丽江大研镇方氏的一世祖”。

这一说法，谱系清楚，具体细节颇详尽。方先生曾在《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著录了记载潜山方氏入滇的重要文本证据——方之贵《云南左卫中千户所试百户承袭供状》，该供状写于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1658），详细记载了上述情况，列举出了方氏入滇后的具体世系，方之贵系十世祖，是云南左卫中千户所之下十个世袭百户伍之一。为了证明此份文件的真实性，方先生引用大量史料详加考释，强调“《供状》历叙一家事迹，以当时政令行事与史籍记载相合”，并根据《供状》上的“签印原件”，详细介绍了洪武十五年（1382）正月初设云南左卫时颁发的“云南左卫中千户所管军印”。不止如此，方先生还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昆明地藏寺经幢）其东南一里许杨泗庙后，瑜高祖以上三代祖坟在焉。一九二二年八月初来昆明，从伯兄瑞周扫墓，至地藏寺废墟，摩挲古幢，良久始去。次岁余读书北京，十余年间，数往返过昆明，必至古幢旁。（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

对照以上各种证据，方先生的家世认同很清楚，即丽江方氏先祖系安徽安庆府潜山县人氏，明洪武十五年随卫所移民入滇，此后又迁至丽江定居。潜山与桐城毗邻，同属安庆府。根据潜山方氏宗祠资料显示，今潜山方氏堂号曰“壮猷堂”，入潜山之祖为方源甫，与桐城方氏系出同宗。依其族内辈分排行，丽江方氏之先祖方原仲，极有可能是潜山方氏七世祖中的一支。

如今的云南人，大多都有先祖随卫所入滇的移民记忆。明代云南卫所军事移民构成了入滇云南移民的主流，且形成了云南“土著者少，寄籍者多”的民族人口格局。陆韧师在其专著《变迁与交融——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中指出：明洪武十八年（1385）前，云南都司建立了云南左卫、右卫、前卫等九卫一所，由平定云南后留镇该地的九万官军组成，“他们成为明代进入云南的第一批军事移民”。有明一代，入滇的卫所官军人数达到二十八万人左右。而且，其时官军入滇携带家眷子女，“所有卫军，每一军士为一户，家属大都由原籍同来”。根据国内较多采用的明代军事移民“每户按三口计算”的办法，明代入滇军事移民的第一代人口“有可能达到八十余万”。陆韧师进而认为：“汉族移民进入云南后，在明代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土著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结合于云南土地，交融于当地民族，实现了从流徙到定居、从外来客民到世居云南人的转变。”

内地学人多以为方先生借桐城方氏之名自抬身价，实际上忽略了民族融合是一个双向过程，不仅存在大量的夷人“汉化”现象，还应充分考虑到内地移民逐渐融入当地民族之“夷化”过程。“汉化”与“夷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区都有发生，从夷至夏，自夏而夷，这是非常正常的。陆韧师指出，深入云南边远山地民族聚居区的汉族人口，“为了生存，特别是在明末卫所制



度弛坏，战乱纷争的情况下，势单力薄的汉人只能迅速融入当地民族之中才能生存”。方先生对此深有认识，他曾指出：大抵云南坝区多汉人，山区多彝人，可能住在坝区的彝人多融合于汉人，而住在山区的汉人多融合于彝人（方国瑜：《明代云南的卫所制度与开发生产》）。

就以他的家乡丽江为例，明代丽江始终由木氏土司统治，几乎没有大规模的汉族移民进入。一九四二年，方先生撰《么些民族考》一文，正面回应了明代流寓丽江之汉人“么些化”的历史过程：

瑜曾遍访明代古墓，间有龚、杨、李诸姓，乃土司之把事，而大都姓和也。或拆和字曰：和为木字戴笠负筐，取义木氏之奴隶，故今齐民皆姓和。不识初意为如是否？今大族有谱牒已复本姓者，犹记未归流前曾姓和；未复本姓者，亦多记迁丽江后改姓和；又有不言初姓，惟述其先为应天府柳树湾人者。凡此追述先祖，多为汉人而从土人之姓，则习俗之同化于土人，尤意中事。明代如此，明以前更可想见。则今日所目为么些族者，必多有汉人血液，其文化亦多自汉族传播。不能以语言、服饰、习俗之稍异而识别民族，此则西南民族皆如是，不仅么些族也。

这段话不仅阐述了明代入滇移民“变服从俗，渐化为夷”的历史事实，而且隐隐自辩，强调汉人与“么些”同宗一体，“不能以语言、服饰、习俗之稍异而识别民族”。以下方先生一番颇具卓识的宏论，更能反映他对这一问题认识之透彻：

吾人研究西南民族，苦名号繁夥，实由一血统民族文化歧异，则各立名号，愈分而愈多；亦有数民族之文化融合，名号渐失者，若甲民族之少数人迁至乙民族区域，久之即被以乙民族之名称。今日纳西族中，不少有汉人及其他民族之血液，而既同于纳西文化，亦直视为纳西族也；又有初为纳西族，迁与其他民族同化，则又以其他民族称之。……想必有一日，西南民族之众名尽归于消失也；若以血统言之，今日西南民族中，鲜有不混血者，众族之汉文化程度有差异，亦即汉族血液多寡之差异，所以犹保持其名号者，则由历史观念使然耳。今之纳西族受汉文化陶熔已深，则不惟不用么些之名，即纳西之名亦可废。（方国瑜：《么些民族考》）

从这段话里能够细微体会到，方先生纠结于“汉人移民”与“纳西人”的双重身份之下“夫子自道”式的隐痛。他定然是听惯了顾颉刚所说的那种“闲话”，试图弥合纳西人与汉人之间的族群界限，甚至预言“想必有一日，西南民族之众名尽归于消失也”，不仅主张废除带有侮辱性的“么些”之名，“即纳西之名亦可废”。如此惊世宏论，与顾颉刚喊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何其殊途同归。

二、谁制造了这个“族籍”话题？

回想当晚谈话情景，方豪显然是话题的发起者。他的问题“你们云南姓方的是从哪里迁来的？”很冒失，这使方先生陷入尴尬之境。那时的方豪只有二十九岁，“以后辈自视”，年轻而好发问，言语不免莽撞。然则，最可怪的是顾颉刚先生。顾的一番解释明显有“带节奏”的嫌疑，令陈寅恪也忍不住“插嘴”。按理说，顾不应该强调方先生的“么些”身份。因为在一个月前，他刚完成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一九三九年二月六日，顾收到了傅斯年的来信，傅批评顾负责的《益世报·边疆副刊》分析中华民族为若干民族，“滥用‘民族’二字以召分裂之祸”，并强调“夷汉是一家”，督促顾站在“民族大义”的高度思考民族问题。顾读到如此恳切的意见，“顿然起了极大的共鸣和同情”，“在病榻上再也按捺不住”，于是用三天时间撰写了此文，开首就强调“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在国家分裂危机之下，我们不应该谈汉、夷有别，“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



再者说，顾颉刚来昆之前，刚刚深入考察了西北民族地区，他完全了解内地移民内迁边地并“番化”的史事。顾在昆期间完成的《浪口村随笔》卷六里就有多条笔记对此有深入论述，如谓岷县境内妇女之服饰，“皆明代习尚”，具有内地移民之遗存特征（《明初西北移民》）；又谓“西宁汉人俱自谓由江南迁去，想亦于明初从征而往，遂屯田为土著者”（《临潭居民祖籍》）；又谓内地迁入西北之孔子后裔，皆奉回教，逐渐“番化”之事实（《边地孔裔》）。按理说以史学家“同情”之心理，他自应懂得方先生“桐城祖籍说”的内在含义。既然如此，顾颉刚为什么还要“暴露”方的“么些”身份呢？

方豪是无心之言，顾颉刚却是有心如此。因为那晚他的心情甚是不爽，在生方先生的闷气。顾在日记里记述当晚活动，还有这样一段文字：

方国瑜夫妇（主）与膺中、莘田等人同席，胸中顿起不快之感。如此佞人谗人，予真无法与之伍也。然渠等要打倒我十几年了，究竟把我打倒了没有？思之亦颇自豪也。但望我身体好，能工作，便一切都不怕矣。（《日记》一九三九年三月五日）

确切地说，惹恼顾的不是方先生，而是语言学家罗常培（字莘田）和文学史家罗庸（字膺中）。“二罗”形影不离，关系极好，刚由长沙辗转来昆，任职于西南联大北大文科研究所。“如此佞人谗人”亦指“二罗”，其时顾与方相识不久，没有恩怨。当晚方国瑜夫妇选择与“二罗”同席，这让顾颉刚萌发“醋意”，故而“胸中顿起不快之感”。顾与“二罗”积怨已久，不满之情在他的日记里多处流露：

数日来看《桃花扇》，觉得阮大铖之为人绝似莘田、膺中，其吸引朋党，排挤正士，蒙蔽权要，抢夺势力，闭目思之，实出一型。阮氏亡了南明，彼辈亦亡了北大！（《日记》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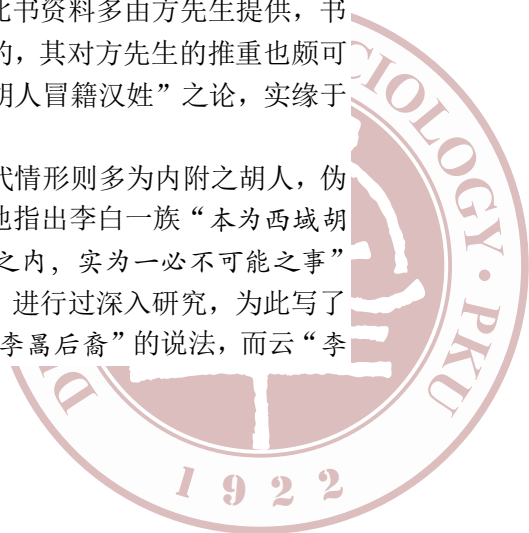
每见膺中，胸中辄作三日恶！（《日记》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二日）

上午道遇膺中两次，胸又作恶。所以然者，彼既奸佞而又傲慢。（《日记》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二日）

顾颉刚与“二罗”交恶，恐怕缘于他和鲁迅的旧怨。顾和鲁迅、“二罗”先后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都做过同事，众所周知，顾与鲁迅关系极其糟糕，在中大甚至闹到“鼻来我走”的程度（鲁迅暗讽顾是“红鼻子”）；相反，鲁迅与“二罗”则交谊甚厚，罗常培曾随鲁迅在厦大任教，后去中大，可能鲁迅也有举荐之力。罗庸则于一九二七年应鲁迅之邀，担任了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因此，在顾、周之争中，“二罗”免不了站在鲁迅一边。顾颉刚厌恶罗庸似更甚于罗常培。从顾的日记来看，顾与罗庸时常见面，且共同出席各类活动，但从没有私下的交往。学界常说顾颉刚与傅斯年矛盾甚多，然则顾、傅二人乃是诤友，尽管吵得面红耳赤，但颇能相互尊重。相比之下，顾与罗庸几乎就是不共戴天的仇敌。顾在日记里说“要打倒我十几年了”，所指或在此。当晚的方先生与“二罗”同席或许也是无意之举，但这可能触及了顾敏感的神经。

那么陈寅恪先生为何要“补刀”呢？个人以为，这与私人恩怨无关，陈寅恪所言属于历史学家茶座上的“闲谈”，唯借此阐发一下学术观点。一九三八年底，陈寅恪作《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赞叹是书资料宏富，“所未见者，殆十之七八”。然此书资料多由方先生提供，书成后，陈垣又托陈寅恪将此书送予方先生。陈寅恪定然是了解内情的，其对方先生的推重也颇可窥见一二。因此，陈寅恪对方先生绝无贬低鄙视之意存，其所持“胡人冒籍汉姓”之论，实缘于他的学术关注视野及其长期坚持的“中国文化本位论”。

陈寅恪研究专长在中古史，不太留心明清边疆情态。他所见唐代情形则多为内附之胡人，伪托汉姓以自高。他对李白“诡托陇西李氏”的研究就是典型例证。他指出李白一族“本为西域胡人，绝无疑义矣”，“自称其先世于隋末由中国谪居于西突厥旧疆之内，实为一必不可能之事”（《李太白氏族之疑问》）。此外，陈寅恪还对唐朝皇族的“李姓”进行过深入研究，为此写了三篇文章。最初，在《李唐氏族之推测》中驳斥了“李唐自称为西凉李暠后裔”的说法，而云“李



唐先世疑出边荒杂类，必非华夏世家”。此后，又作《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对研究结论进行修正，认为“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

种种迹象表明，陈寅恪骨子里仍有“夷夏大防”之思想遗留，他曾于《论韩愈》一文中列举韩愈在唐代文化史上之功绩，有“六门建树”之概括，而“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就是其一。他论边疆民族，多以“中国”“华夏”与边地民族相对举，如云李白入中原，而谓“太白生于西域，不生于中国也”，“西域之人其名字不通于华夏”等等。陈寅恪《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云：“明末永历之世，滇黔实当日之畿辅，而神州正朔之所在也。故值艰危扰攘之际，以边徼一隅之地，犹略能荟集禹域文化之精英者，盖由于此。”说此番话时，身处滇南“边徼一隅”的陈寅恪一定是为日寇乱华而发，但确有“聊与胡僧话落花”的文化落寞之感。

三、内地人和边地人的隐性对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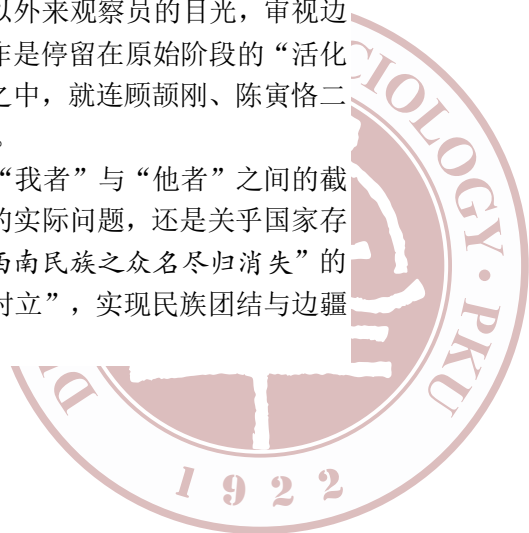
其实，在这个看似融洽的晚宴背后，尚能窥见内地人和边地人的隐性对立。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间，政客、资本家、文化人、学生、难民等各色内地人等纷涌入滇，云南人与内地人开始在试探中接触，接触中试探，尴尬别扭之间，获取的信息未免片面，“看不惯”的对立情绪未免生发。内地人闯入“边僻之乡”，潜意识里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他们以文明先进自居，高高在上地批评云南人落后、懒惰、不卫生、文化程度不高，蔑称云南人是“老滇票”，意谓云南人如同本地货币一样老土而“不值钱”；而云南人一方面有强烈的自卑情结，承认内地人来自更高层次的文明，但另一方面无法忍受内地人的趾高气扬，以及过于新奇的生活方式、理念、奇谈怪论乃至着装、行为，甚而扬言要“教训下江人”。

一九三八年六月，云南本地学者楚图南为此发表《尊重与宽容》一文表示：其时入滇的内迁人口，对于这个边远民族省份而言，是“明以来第一次最有意义的华族的移民”，他们都是“从更高阶段的社会和文化里面出来的人”。内地与云南不断“发生影响”，自然会“使云南的文化进到了一个更新的阶段”。楚的姿态放得实在太低，其实这很难说是真正的“尊重与宽容”，反而让人感觉是“拖了后腿”之后表示要努力“跟进”的一份检讨。

那个年代的云南学人多有此种“积极向内地靠拢”的情绪，尤其是面对蜂拥而至的内地文化精英之时。“南荒边僻”“蛮夷之邦”的云南形象，似乎成为云南人挥之不去的文化阴影。方先生也是如此，他反复强调“云南地方史为中国史不可分割之组成部分”，对云南的历史“身份”饱含有异乎寻常的国家认同意识。今天看来，云南理所当然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大可不必强调，方先生为何较真呢？这正与他长期所受的时代“刺激”有很大关系。方先生《自序》开首一句也颇有意味：“国瑜生于边僻之乡。”他深感云南落后，似乎自带“蛮夷”属性，需要“改造”，热切地希望云南获得与内地省份一视同仁、平起平坐的“身份”，生怕被抛弃。

当晚赴宴的罗常培、万斯年、闻宥、方豪诸人，皆有民族调查的经历。以及当时以杨成志、马长寿、吴文藻、江应樑、费孝通等为代表的民族研究新锐，尽管都具有了民族平等的姿态，但潜意识里的内地与边地、汉人与“蛮夷”的二元对立思想仍在不自觉地左右着他们的脑筋。他们自己都相信自己是“从更高阶段的社会和文化里面出来的人”，而以外来观察员的目光，审视边疆民族社会的种种“蛮夷”生态，“恍游博物院”，把边地民族看作是停留在原始阶段的“活化石”，可供研究而不可苟同。身处“内”与“边”急剧交融的洪流之中，就连顾颉刚、陈寅恪二先生也不能免俗。这也正是近代“民族考古”风潮兴起的思想基点。

然则，尊重与宽容是必须的，消弭内地与边疆、汉人与夷人、“我者”与“他者”之间的截然分异，是民族平等、民族融合的必由之径，这不仅是人际交往中的实际问题，还是关乎国家存亡命运的大方向。顾颉刚撰写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与方先生“西南民族之众名尽归消失”的疾呼旨趣相映，某种程度上都是相互尊重与宽容，消除这种“隐形对立”，实现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的重要体现。



【编者按】陈平原教授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专家，在发表在《读书》杂志的这篇文章中，他针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讨论引发一些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议题：

第一，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应当包括以汉文形式和以少数民族文字形式（未必是母语文字）创造并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这两大部分，这里包括了少数民族作家以汉文创造的诗文（在元代、清代是较普遍的现象），也不能排除汉人作家或某少数民族作家可能留下的以当时占主流族群文字创作的作品。这些方面的发掘和研究工作必须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中文系”的“中文”不是仅指“汉文”而是包括了中华民族各个民族的语言文字。

第二，为了将汉文文学作品和少数民族文字文学作品介绍给国内外其他读者，不同文字作品的互译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应当视为“文学再创作”。例如维吾尔族翻译家托呼提·巴克先后把《鲁迅杂文书信选》和8卷本《鲁迅文集》译成维吾尔文出版（参见《通讯》第64期），就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由于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的读者群规模和市场价值有限，非常需要政府部门和民间组织给予特殊的扶持和帮助。少数民族文学应当列入各大学中文系的教学内容。陈平原教授提出“在大学里开设相关的必修课或选修课”，我是完全赞成的。

第三，由于多种原因，我国广大汉族读者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了解有限。按照陈平原教授的提议，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文学精品的汉文译本编辑出版一册少数民族文学读本，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我国曾经编写出版过一些少数民族的民间故事集，如《阿凡提的故事》《巴拉根仓的故事》等，都给汉族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我们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认同是基础，为此我们需要构建一个“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体系。汉文和少数民族文学精品的互译和传播就是一项基础工程。

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华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记载了本族的演变历史、社会发展和人们的智慧与情感，也记载了历史上族际互动中的文化交融和感情互动。古今中外，不同文化和族群之间的交往互动都是文学创作的主题之一，其中不乏感人的爱情和战争故事（如普希金的《高加索的俘虏》，果戈里的《塔拉斯·布尔巴》）。希望今后我国的学术界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能够给与更多的关注。

（马戎）

【论 文】

编一册少数民族文学读本，如何？¹

陈平原

《读书》2017年8期新刊

两年前，我在云南民族大学于腾冲举办的“中国多民族文学高层论坛”上做主旨演说，谈论确立多民族文学的视野，对于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意义，其中提及：“今天的实际状态是，谈论少数民族文学，不管创作还是研究，都只局限在小圈子里，没能进入更为广阔的公共视野。或许有必要编译一册少数民族文学读本，并在大学里开设相关的必修课或选修课。这么做，比简单地宣讲民族政策更有效果。”至于此举的目的，是“促使汉族学生更多地了解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及文学”。

¹ [https://mp.weixin.qq.com/s/tuDpABsDYyXzeAxcVAXokA\(2021-11-5\)](https://mp.weixin.qq.com/s/tuDpABsDYyXzeAxcVAXokA(2021-11-5))

